



中国共产党人 “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

——重温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 卫灵



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撰写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出版社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版了单行本,后又再版。这篇文献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并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重温这篇文献,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仍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不同的民族观

刘少奇青年时期在苏联学习,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十分关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下,刘少奇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以国际视野分析民族主义,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族观本质的不同,指出“民族问题是与阶级问题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即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是根据它的阶级基础、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外,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以“民族”的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在国外,以牺牲其他民族利益为前提,把本民族——实则本阶级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对立起来。资产阶级极端民族主义演化的最高形式,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就是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截然不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民族的看法,以及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从本国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的,主张国内外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及其形成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民族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观,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反帝反殖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立场,是刘少奇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强调的核心内容。二战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积极争取民族解放,出现了战后民族独立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走向解体。在这一进程中,刘少奇指出,一切被压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联合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他反复提醒第三世界国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绝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虽然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赢得不同程度的独立,但是“新殖民主义者名义上承认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实际上却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把这些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一边,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国主义反殖主义,主张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他指出,共产党人“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脱离本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完全独立与完全解放”,“共产党人如果不去具体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为民族解放而斗争,而只把‘国际主义’当成装饰的空谈,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仅在立场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在行动中也力所能及地给予亚非国家必要的援助。刘少奇说:“我们是真心诚意帮助亚非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我们在给援助时,没有任何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他在1949年11

月16日北京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鼓励所有反帝国主义反殖主义的国家:“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

正因为中国人民自己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深知受三座大山压迫之苦难,于是坚持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立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反帝反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少奇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最坚决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保卫祖国独立自由、反对一切卖国贼的革命的爱国体系开始走向解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与本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积极组织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规模的规模,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各阶级联合组成统一战线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给我们留下深刻启迪的,不仅是刘少奇深刻阐释的民族观,还有他以历史的视野、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刘少奇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有过进步性。人类社会是在发展中不断变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历史看任何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区别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其不同的客观作用,并决定了无产阶级对它的不同的态度。当资本主义初起时代,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民族运动,是为反对异民族压迫、建立民族国家。这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兴起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在推翻封建专制、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构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狭隘性就暴露出来,利用民族主义“加紧对本国人民的压迫和对全世界各民族实行侵略”。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民族说成是“优良人种”,以此为理由去压迫所谓“劣等民族”。民族主义在错误的引导下,甚至演变为种族主义,引发冲突和战争。这一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评判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作用和影响。

在这篇文献中,刘少奇还重点分析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相互关系,他强调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二者是互相结合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与排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完全不同,“真正的爱国主义乃是对于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自己祖国、自己人民、自己语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热爱……纯正的爱国主义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时希望世界人类优秀的理想在自己国内实现,主张各国人民的亲爱团结”。刘少奇批评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煽惑各国人民的互相敌视与仇恨”,“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绝起来”。刘少奇以国际主义视野,辩证认识爱国主义;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实践真正的国际主义,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既是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主义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和立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要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今天的坚持和发扬,也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与抉择。



近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的《干部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正式出版。

本期首篇刊发的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王君正的《着力以高质量教育培训建设高素质的治藏稳藏兴藏骨干队伍》。文章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工作实际不断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水平,建强建好干部教育培训的主渠道主阵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在“学习贯彻《条例》《规划》”栏目,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党校校长任少波在《建设高远使命引领的高校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一文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应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构建干部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以高远使命为引领,锻造具有领导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以国家战略为导向,打造一流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

本期“特别策划”聚焦加强党性教育,约请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加强党性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宝贵经验、现实问题和破解举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刘宝东梳理了开展党性教育的百年探索历程,提炼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党的初心使命为根本、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主线、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重点、以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为抓手、以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为保障的历史经验。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丁俊萍结合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及其特点,指出为进一步促进党性教育提质增效,应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性的重要论述所蕴藏的思想启示,注重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四川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田仁来分析了当前党性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够强的具体表现

聚焦加强党性教育

□ 薛景文

及问题成因,提出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的现实路径,即加强党性教育政策协调、注重党性教育内容供需匹配、强化党性教育主体协同配合、拓展党性教育对象有形有效覆盖、改进党性教育方法手段、推动党性教育支撑体系集成高效。

本期“名家访谈”专访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围绕如何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新时代如何坚持“两个结合”、领导干部怎样“学会讲话”“讲好话”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另外,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陈柳裕等围绕基本培训的三个维度、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陈家喜等围绕推进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分别展开论述。在“体系建设”栏目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第一副校(院)长高祖贵就构建完善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课程体系展开论述,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蒋元涛基于现实情况分析了干部教育学二级学科发展方向问题。



多角度阐释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

——读[美]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 马丽雅

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其三,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奈斯比特夫妇以森林和树木比喻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和人民自由,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民主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其四,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变革是在实践中学习。其五,艺术与学术的萌动为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六,融入世界。这一支柱表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正在争取与自己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其七,自由与公平。该支柱强调,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动

力,是推动自由与公平的“金钥匙”。其八,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中国将会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奥运会上的辉煌。奈斯比特夫妇强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决于从模仿到创新,从为外国品牌进行加工转变为拥有自主品牌。他们指出,中国正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

借两种力量之合力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开篇就提出,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结合之中的,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奈斯比特夫妇把这种两者的合力称为“纵向民主”。

一方面,“纵向民主”是中国创建

“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成果。他们指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中国人则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事的要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下面可以在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的不同作出合理调整,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

另一方面,奈斯比特夫妇认为“纵向民主”模式探索的过程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的。他们分析道,在“纵向民

主”模式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注重考虑普通民众的意见,包括“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这种模式既需要政府信任人民,也需要人民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他们还感叹,“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争取与自己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

奈斯比特夫妇积极评价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活动,他们强调,中国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登上了世界大舞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应该得到世界的认同和尊敬”。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不断融入世

约翰·奈斯比特是美国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他出版的《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1967年起,他多次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进行持续研究。《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是约翰·奈斯比特与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在中国完成了大量资料收集工作和实地走访之后形成的著作。在书中,他们从八个部分阐述了中国社会实现发展的基础,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展现着自身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无限可能。

“八大支柱”助力中国发展

奈斯比特夫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利益。这种长远策略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不可能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与此同时,它一直坚持着发展过程中制定的共同目标,并为此不断努力。他们比喻道,中国就像一个已经实现了重组的超大企业,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其一,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解放思想。其二,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

界经济,登上世界舞台。中国致力于“融入世界、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文明、携手共创未来”。奈斯比特夫妇指出,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合作,在发展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了“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企及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外国领导人也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命运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表明它正在争取与自己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奈斯比特夫妇谈道,“西方国家在中东、中非和南美影响力的逐步下降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非常乐意介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拒绝投入的项目”。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逐渐走进聚光灯下,不仅参与到表演中,而且还改变了角色分配和舞台场景。”因此,他们也得出结论,“理解中国的唯一方式就是搞清楚中国的真实想法,而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人的想法”。

《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展现了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发展的乐观预期,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与审视。

